

欣慰的回忆

郭根保

195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大喜日子。中共中央、国务院邀请各条战线英雄模范人物,到首都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我有幸以农业战线劳动模范身份,代表包头市广大农牧民,参加了国庆盛典。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国庆十周年观礼团成员中,来自农业战线上的40多位代表,大多是赫赫有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到京后安排在景色宜人的西苑饭店下榻。华北三省区的代表,有河北省的王国藩、耿长锁;山西省的李顺达、申纪兰;内蒙古自治区树起的“八面红旗”中,邀请了5个人,即:凉城县金星生产大队的郭老虎,和林县太平庄生产大队的王太,乌拉特前旗的于占海,呼和浩特市郊区西菜园生产大队的段润锁和我。在他们之中,我的年龄最小,31岁刚出头。

9月30日下午6时许,我们分乘专车,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了毛泽东主席、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为庆祝国庆十周年举行的盛大国宴。周总理致欢迎词。应邀赴宴的,有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贵宾和我国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约5千人。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场面,激动得浑身暖融融,犹如一团火,只顾回味总理的讲话精神,连摆满餐桌的各种名菜,也未品出是什么“味”来。

10月1日上午10时正,首都7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建国十周年庆祝大会。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讲了话,国防部部长

林彪向陆海空三军发布了命令。我们在天安门前西红一台,观看三军阅兵式、各路游行队伍和体操、文艺表演。既要看天上“飞”的,又要看地上“动”的,眼花缭乱,大饱眼福。使我激动万分的是,眼望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雄伟壮观的天安门城楼上,向游行队伍频频招手致意的情景,深感领袖和人民永远在一起;与此同时,展现在面前的天安门广场,五彩缤纷,群情鼎沸,“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落,成为时代的强音。此景此情,涌上我的心头,更加坚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信念。

周总理同我握手的时候

10月2日,喜讯传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要在下午3时接见农业战线上的观礼代表。午餐后,我们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乘车直达中南海,正围着丰泽园南楼湖边水榭,好奇地观赏旖旎风光,忽听汽车马达声响,转眼驶来4辆红旗轿车。从第一辆车走下来的是周恩来总理,身着深灰色中山服,步履矫健,频频招手,向我们走来,随同前来的还有谭震林副总理和邓子恢部长等。我们不约而同,站好“一”字队形,恭候总理的接见。

周总理走到我们身边,先是亲切地向大家问好。我们齐声致意:“总理您好!”周总理走到大家面前,一面握手,一面询问是哪个地区的代表,叫什么名字。当问到我时,我毕恭毕敬地回答:“我是内蒙古包头的,叫郭根保。”这是我同总理第一次握手,眼含激动的热泪,不知该向总理还说些什么好,似乎我那粗笨的手,比别人握得更紧,握的时间更长。总理的记忆力非常好,当他同那些老劳模握手时,象多年的老朋友,一见如故,亲切地称呼他们的名和姓。他见了王国藩,称赞道:“你们‘穷棒子’社办得好啊!”又问李顺达:

“大队的山沟里，栽了多少棵果树？”……这几位头罩“羊肚”毛巾，身着布衣的农民使者，言简意明，作了回答后，总理高兴地微微点头，连声说“好，好！”

总理同我们一一握手后，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对你们艰苦创业，做出的功绩，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感谢。请你们到首都来，亲眼看看我国十年来的建设成就，看看首都的十大建筑。要注意休息，不要搞得太紧张、太疲劳。”聆听总理这番话，心里愈觉熨贴。我暗下决心，回去后一定要把工作做得更好，以报答党中央、毛主席和他老人家的恩情。

康克清同志的深情厚意

包头是祖国北疆重要工业基地。自 1954 年以来，中央首长和自治区党政领导同志，借视察包头之机，曾多次光临解放菜园参观访问，指导工作。这对全村社员群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记得吴玉章、乌兰夫、彭泽民、王维舟、杨明轩、康克清、王再天、尤太忠等领导同志来到菜园后，边看边问，鼓励我们多种菜、种好菜，支援工业基地建设，不断增加社员收入，把菜园办得更好。

这里，使我终身难以忘怀的是，康克清同志两次来包期间，都曾专程前来解放菜园，嘘寒问暖，谆谆教诲，把党的关怀送到我们中间。第一次是 1954 年，她随同朱德副主席来包视察工作时，由市妇联主任米志陪同，来到我们的菜园，走访长工大院，参观蔬菜生产，还登门访问了村党支部书记屈占泉和我的家。当时，我结婚不久，陈设铺盖一新，她看了非常高兴，表示美好的祝愿。在谈话中间，她顺便问我结婚时“摆过酒宴吗？”“摆过”我内疚地回答。她又关切地问道：“那一定花费不小，欠没欠下外债？”当我嗫嚅地说出欠下 300 元债务时，康克清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农村青年结婚，要提倡新事新办，不要铺张浪费。终身大事嘛，喝喜酒庆贺一番，是可

以的,但要记住,千万不要借债摆筵……”短短几句话,感人肺腑,使在场的人认识到勤俭持家,要时时讲、事事抓,即便是以后生活富裕了,也切不可丢掉这个“传家宝”。我当即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劳动,勤俭过日子,尽快把债还清。”

1957年,康克清同志又一次来到解放菜园,向乡亲们问这问那,十分关心蔬菜生产和社员生活安排情况。她到我家作客,在毫不拘束的谈话间,突然问道:“小郭同志,你结婚时的外债,还没有还清?”这使我和全家人倍感亲切。真没有想到,时隔3年之久,康克清同志还惦记着这件区区小事,这说明了那个时期党的高级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情深。顺便插一句,我那笔外债,是当时32位长工兄长,你10元,他8元,主动借给的。我在婚后第二年就还清了。

荣誉属于全村父老兄弟

话又说回来。象我这样一个普通农民,能够同全国著名劳动模范一起,参加建国十周年、二十周年两次国庆观礼,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因此,当年在首都北京的日日夜夜,或者打那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不由想起自己的成长过程,无论在思想政治上或者工作能力方面,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党和人民倾注的心血。

解放前,我在12岁那年,就给包头的大地主“复盛园”扛长工。1949年全国解放后,我们这些当牛做马的贫雇农,翻身得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1951年2月,我和原复盛园的32户“赤腿穷汉”,在市农村工作队程远同志的指导下,把减租反霸分得的330亩耕地,归共同所有,统一经营,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解放菜园”,并实行按劳分红制度,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当年喜获蔬菜生产大丰收。这一年,我也是“双喜临门”:一是大家推举我当了菜园主任,副主任是栗保和、杜富仓;二是经党支部审查、讨论,报乡党

委批准，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53年，经上级批准，解放菜园成立了全市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共650户，拥有耕地1112亩。是年，合作社荣获包头市模范单位称号，我也被评为市农业劳动模范。

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区党委和政府，对近郊发展蔬菜生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四处奔波，千方百计，引进蔬菜栽培新技术，并聘请京郊四季青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李默林，传授温室生产的技术和经验，大力发展保护地蔬菜生产。到1956年，南龙王庙、东河村、刘宝窑、先明窑4个村，先后建起1000多间温室、30多亩塑料大棚，还兴修了刘宝窑、先明窑两处电力扬水站，东河村和南龙王庙打6眼深井，缓解城市生活用水与农田用水的矛盾，保证了1000多亩菜田的灌溉。从此，全社每年可向城市提供各种商品菜700多万斤，其数量和品种之多，质量之优，价格之稳，远近驰名，已成为自治区内高产、稳产蔬菜生产基地之一。70年代起，我社已逐步实现多品种、多茬次的均衡生产，基本上做到了“四季常青”。这些变化和成绩，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全体社员一条心、一股劲，艰苦奋斗的结果。我作为他们的代表，从1953年至1964年曾获得包头市和自治区劳动模范、包头市和自治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等12项先进称号，1977年又当选自治区和全国五届人大代表，先后两次进京参加国庆观礼，晋谒党和国家领导人，分享了很高的荣誉。这都应当归功于党，归功于家乡父老兄弟姐妹们。

回顾既往，心潮澎湃。秋月春风数十载，是解放菜园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也给了我接受殊荣的良好机遇。所以说，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菜园，也就没有我今天的郭根保。

（作者为包头市郊区原河东乡党委副书记，已退休）

“爱民井”与五块银元的故事

程景华

1945年11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晋绥部队,在贺龙司令员和王尚荣、周士弟、姚喆、黄厚等同志率领下,解放了萨拉齐县城。9日上午,大部队前进到城西40华里的沙尔沁村驻扎下来。指挥所设在松柏掩映、居高临下的沙尔沁新召内。在这里,贺龙元帅与其他负责同志,按照既定的战略目标,部署了攻打包头的战役。

当解放军某部指战员们经过急行军后,进驻呼包公路北端,大青山南麓的一个小村庄时,大家又饥又渴。一宿营,首长们吩咐烧水做饭,可是,谁也找不到水井。正在这着急当儿,乡亲们你一桶、他一罐,把家里存的吃水献了出来。一个老乡解释说:“我们村里,户数少,人又穷,水深石头硬,从来打不起井,全村人畜吃水,全靠山洪或者冬天存冰化水食用。”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贺龙司令员那里。次日晨,他同警卫员骑马来到村里,亲自查看地形,选择打井地点,立即发动军民一起挖井。在贺老总亲自领导下,一眼深井很快就打成了。当指战员们把清澈甘甜的井水,一担又一担,送到老乡家里时,全村人声鼎沸,许多人高兴得热泪盈眶。村民们为思念贺老总的恩情,一致决定将这眼井命名为“爱民井”。

当时,司令部的代号叫“一连”,连部驻在贫农张福院内。每当开饭的军号一响,司令员和其他指挥员便下山到“一连”,和战士们一起就餐。一天,又开饭了,张福瞅这机会,想认一认赫赫有名的贺龙将军。一看,果然有一位留着黑胡须,身穿粗布军装的“长官”,吃的也是小米饭和素烩菜,很惊讶:“难道这就是南征北战,为穷人打天下的贺老总?”过后,他觉得贺老总连一点肉也不吃,这咋行!于

是，他从羊圈里挑选一只肥大的绵羊，宰后把整羊送给院里的炊事班，并说：“同志们，这是我慰劳贺龙将军的，请你们收下吧……”班长忙说：“老房东，我们首长早有命令，老乡的一针一线也不能动。”贺司令员知道这件事后，破例下一道“指令”，让炊事班把羊肉留下，给全连改善了一次伙食。过了几天，队伍要开走了，张福老汉和全村男女老幼，依依不舍，在送走亲人解放军后，回到家里刚一进门，老伴忙把五块银元递给他：“这是队伍临行前，贺老总还给我们的羊肉钱”。张福看着老伴儿手里的钱，激动地说：“贺老总真是人民的‘好长官’”。

（作者生前系包头市郊区鄂尔格逊小学教师）

大 桦 背

荣 阁（蒙古族）

乌拉山的最高峰——大桦背，位于包头市郊区西部边缘，海拔2322米。因桦树茂密，故名。1984年前，此处属哈业胡同公社所辖，历来是梅力更牧民理想的天然牧地。

大桦背的山势巍峨，山路曲折蛇行。两山夹峙，斜坡陡峭，脚底深渊。土层为栗钙土、褐土，山石嶙峋怪异，多为结晶岩、片麻岩、页岩和大理岩。向阳处岩石裸露，植被稀疏；向阴处土质肥沃，桦树群落中，间有松、柏、杨、柳，葱葱郁郁。山间时见苍鹰盘旋，喜鹊飞落，小鸟雀跃，跳鼠逃窜，增添了勃勃生机。多少年来，人们到此一游，饱览山景，举目鸟瞰，无不怡然自得！

（作者为包头市青山区政协文史委编辑）

乔培新同志在抗战初期的二三事

武虎瑞

编者按：乔培新同志系前包头县虎石梁乡本坝沟村人，现年78岁。早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初期，曾任绥西专员公署视察员、五原县“动委会”书记、包头县游击县县长等职。后转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本文第一部分，系根据乔培新同志来函所述整理的；第二、三部分，则根据于纯斋所写河套“动委会”有关资料和乔培新同志给中共包头市委的一封信中对组建包头县提供的材料整理的。



乔培新同志近照

万亩土地霸占案真相大白

乔培新同志1937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经济系。“七七”事变，日寇大举侵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乔培新同志遵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返回故里，相继在归绥、包头和河套地区做党的地下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绥西专员公署视察员，派驻临河县平市官钱局。到职不久，就遇到一件十分棘手的特大土地纠纷案。案情是：临河县杨家河一带200多户农民的两万多亩土地，被大地主杨米仓霸占。由于杨家地主与官府串通，致使这场官司整整打了10年，从县、专、省一直打到国民政府行政院。行政院下交绥

西专员公署清查,专署则把查案任务落实到乔培新身上。乔培新同志掂量出这一案件的份量,心想:既然此案落到一个共产党员手中,自己就应当坚决维护民众利益,实事求是,秉公处理。于是,他开始了认真深入的调查。一接触实际,阶级利害关系就显示了出来。站在地主一边的人吹风说:“你年轻,不懂乡情。河套有三套:红套、黑套和黄套。红套是女人,黑套是大烟土,黄套是土地。你生活在这个地方,总得认一套,完全不理是不行的。”言外之意,无论从中提出哪一套,地主都会满足你的。他不为其所动。又过了一段时间,杨家再次托人来说:“只要关照,愿送银元二三元。”乔培新痛快地答应:“好,钱送来吧。我把款汇到前线,支援抗日吧!”来人碰壁后,灰溜溜地走了。

乔培新同志不辞辛劳,从乡村到城市,访问有关人士和部门,仅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就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临河县地亩局查出了这200多户农民两万多亩土地的产权存根。对查案情况,杨家亦有所闻,唯恐事情败露,便慌忙跑到专员公署疏通。专署妄图掩盖,连拍三次电报,要乔马上回署复命,并且派秘书刘实朴去坐催。事到紧要关头,他同地下党的同志商议后,认定一回公署,事情必难办。为使此案早日昭雪,对方无所措手脚,让正义战胜邪恶,只有借助社会舆论的影响,将杨家地主霸占农民土地一案的情节原委,真凭实据,公诸报端,昭然于世,方可。于是,由乔培新同志署名,把长达7000字左右的调查报告,送交《绥西日报》发表。社会大哗。事后,他回到五原,专署头目对此甚为不悦,不给他安排任何工作。两个月后,另一个掌权的刘姓秘书以责备口气,对乔说:“你那份调查报告又臭又长,不成样子。”乔答道:“文字可能写得不够好,但长可以改短,内容全是事实,丝毫不能更改。”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

1940年,乔培新同志去河套向绥远省汇报工作时,有人送给他一本小册子,叫《十年黑暗,一线曙光》,带回一看,原来是那份调

查报告。

接乔老 1989 年来函谈：“杨家河地主杨米仓，从黄河岸到五加河，长 160 里、宽 50 里的土地，都是用各种手段掳掠到他们手里的。直到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这个土地问题才彻底解决了。”从上述些许文字，可以想见旧社会地主土地之多，财富之广，手段之可恨矣。

出任包头县游击县长

1939 年 2 月间，傅作义将军率师返回河套，出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他派专员到延安，请求党中央派给干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党中央从抗日军政大学选调了一批学员，他们中有潘纪文、王一然、武践实、白杨、安建甲等共产党、民先队员数十人，协助傅作义将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在这些同志的努力下，工作开展的卓有成效。

为了动员全民抗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号召流落在河套的知识青年到省政府登记，从中录取了中学毕业生和同等学历者 300 多人，会同延安来的抗大学员、游击军政工人员，共 800 人左右，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又从中挑选出 300 多人，作为组建省、县、区总动员委员会（下称“动委会”）的骨干，到五原县立第一小学待命。由潘纪文、王一然、崔载之、武践实等执笔，拟定工作方案（含组织机构、工作任务），着手筹建县、区动委会。

根据这个方案，乔培新同志被委任五原县动委会书记，主持常务工作。县长周念慈兼任动委会主任委员，挂了一个虚名。乔培新同志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和有利形势，在民众中作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宣传动员和组织训练工作，搏得各界人士的好评。

1939 年冬，包头县游击县长秦邦楨去职。傅作义主席委派乔

培新接任包头县游击县长。中共河套特委派遣薛巨明、胡庆云(均为中共党员),随同乔培新同志到县里开辟工作。1940年2、3月间,奉中共伊盟工委指示,正式组成了中共包头县委员会。其工作范围,在包头县三、四区、达拉特旗西部和乌拉特前旗前山地带。由县委书记李东甫(又名李秉清,现任陕西省委党校教授)、县委委员李斗垣(任包头县国民兵团团副,化名张子刚)和乔培新三人组成了县委领导班子。对外以包头县政府名义出面,事实上是中共包头县委直接领导这一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10月初,乔培新同志带领新分配来的工作人员抵达四区蒲圪卜村——游击县政府所在地。此刻,秦邦桢县长已离职,县政府处于群龙无首状态,亟待整顿。

当时,包头县三、四区的社会政治情况较为复杂。除云泽(即乌兰夫)同志领导的白海峰新三师驻扎在伊盟地区外,也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布防在黄河沿岸,多数是抗日民众自卫军等地方团队。军队的衣服、粮草,完全由当地群众负担,辅给十分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党的地下县委确定的中心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团结地方友军,战胜各种困难,坚持抗日战争。县政府在人民群众和友军将士的大力支持下,局面逐步打开。在檀盖木独村驻防的民众抗日自卫军二路五团,距蒲圪卜村仅十华里左右。县政府和他们协同配合极好,有时粮食不济时,就派车到五团求援,他们总是慷慨相助。同时,敌情动态,互通情报,配合作战。遇到问题,互相协商,研究解决办法,求得双方谅解。

1940年1月,日军经包头西部进攻五原、临河。五团和县政府,都由四村一带退到六村的刘根渠。驻榆林整训的抗日武装有四、五个团开回来,加强沿河防务。在此紧急关头,其中的陈秉义和邬青云两个团反叛,投降日寇,过黄河驻扎在包头县三区中滩一带,归属伪军王英的绥西联军。驻在柴登的蒙古军森盖队伍,也投降日军,为虎作伥。在此危及存亡之时,军心动摇,民心慌乱,形势

十分严峻。中共包头县委以包头县政府名义,发表了《告同胞书》。文中透彻地分析敌我形势,着重说明敌人的疯狂是暂时的,抗日战争必胜。号召全县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团结对敌,争取胜利。同时,走访地方各部队,宣传一致对外,协同作战,打退日寇的猖狂进攻。

党员身份暴露的前前后后

1939年10月,第一次反共高潮前,蒋介石派来大特务张宜鼎到河套出任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委傅作义为绥远省党部主委,同时安插了许多中统、军统特务,暗中侦察我党我军在河套的活动。形势紧迫,傅作义发给由他请来的中共党员以路费、护照,及时送返延安。同时,对陕、甘、宁边区布设了三、四道防线,伊盟各旗都建起保安司令部,并由八战区调来马腾蛟师,驻防伊盟乌兰吉里庙。一次,乔培新同志赴三专署(即河套地区的专员公署)述职,看到国民党政府内部文件,载有驱除伊盟地区八路军的计划,他返回包头后,立即向县委书记李秉清作了汇报,李又迅速转报伊盟工委负责人杨一木和李维新,党组织提前采取了应变措施。

1940年春,五原县动委会书记程又新被捕叛变,出卖了大批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国民党军警、特务开始大搜捕。各县、区动委会中被捕的,有中共党员安建国、王国华、范建中、刘映元;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有刘无夫、王福田、王会文、耿吉义、姚宣泽等20多人。由此,中共原河套特委所属地下组织,遭到较大破坏。旋于1940年冬,临河县委书记赵子丰又被捕叛变,供出了河套地下党的活动情况,使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因乔培新同志曾通过赵与地下党组织发生过横的联系,他的地下党员身份也暴露了。傅作义得知后,以调乔回河套委任合作管理处处长为名,企图诱回扣捕。乔培新同志对此计有所察觉,故推托应变,未回陕坝。拖至

1941年3月初，傅作义电告伊盟游击司令苏开元，敦促乔培新速回陕坝。

原来，苏开元是南汉宸同志单线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虽然当时尚不知乔是否中共党员，但总觉傅的电召，事极蹊跷，有必要弄清真相，便找乔面告此事。乔培新同志见到苏开元后，证实了傅的“明调暗捕”手段，于3月10日给县委委员张子刚送去一封密信，告知他们迅速转移。他自己带领胡庆云、薛巨明等9人，星夜兼程，奔赴伊盟工委所在地——乌素加汗，请示撤离事宜。工委书记杨一木决定，派王德胜、张四海护送乔培新撤返延安。途中，过了木肯淖约30华里，乔等正在乌审旗一蒙民家喝茶时，薛巨明煽动部分人员逃走。为防止意外，乔培新又折返工委，作了汇报。工委派兵追击薛等未着，便连夜先护送乔培新同志回到延安。张子刚、李秉清等同志，也相继撤返延安。

薛巨明等逃离后，返回包头县政府，向二科科长王殿魁报告乔等逃出情况，王又急报省政府请示通缉乔培新。王反共有功，傅作义便委他为包头县代理县长，责令查明情况，火速上报。就在这时，流传乔培新为护兵暗害，3月19日，自卫军二路五团调遣队伍，包围县政府，拘捕薛巨明等，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弹药和公文什物。3月26日，新任代县长王殿魁具文详报省政府，省政府又于5月29日转报行政院后，蒋介石亲署手令，通缉乔培新。斯时，乔培新同志安返延安，并改为苏芝仁，在陕甘宁边区银行供职，已两月有余了。

（作者为包头市郊区乡镇企业供销公司干部，已退休）



在跟随高克林同志的日子里

王成章 忆述 李文 整理

中共绥蒙分局领导机关，1948年由山西省朔县农村迁至绥东丰镇县，1949年绥远和平起义后到达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在此期间，高克林同志任绥蒙分局书记、军区政委。那时，我有幸担任他的警卫员，有许多往事，至今萦绕脑际，难以忘怀。

记得1948年春，高政委的被子太旧了，我去后勤部领了一条新被子回来。高政委发现后，问我，这被子是谁拿来的？我说是后勤部送来的。他又追问是谁告诉后勤部说他需要换新被子。我觉得不能再搪塞了，就说了实话。他微笑着说：“看来，还是你做的鬼么！”然后，对我讲：“现在，部队和地方都还很困难，我们这里少用一条被子，就能使更需要的地方多有一条被子。上级号召我们艰苦奋斗，咱们领导机关要首先做到。我的被子很好，用不着换。”话毕，就让我把被子送回了后勤部。

高克林同志的穿着一向很朴素。他经常穿的是打着补丁的旧衣服和钉补过的鞋子，只是穿戴得很整洁。穿旧的背心，他也不随便扔掉，洗净剪开来，把平整的部分当作抹布，擦桌凳用。至于办公用品，连用过的信封，也要“翻新”使用。

按当时的规定，军级干部吃小灶，但他经常吃的是小米饭、玉米窝窝。烟酒从不沾边。他还经常对我们说，吸烟是浪费，对身体也无益处，喝上酒会影响工作。

高克林同志是一个不知疲倦、忘我工作的人。他几乎每天都是白天忙个不歇，晚上又工作到深夜。当时照明用的是煤油灯，每天晚饭后，我要擦亮灯罩，把水烧开，以备首长晚上办公。他每天晚上不是读书、看文件，就是写作或批改材料，迟迟不能入寝。为了让他

能早一点休息,我有时把钟表的响铃上到晚间十一点,到时一阵铃声惊动,好促使他去睡觉,但他总是不理会,屋里的灯还继续亮着。一次,我冒着胆子进屋去“强迫”他睡觉,并把煤油灯吹熄了。他并未责怪我,向我解释说:“有许多事情,白天办不完,需要晚上来做,夜深人静,工作效率是很高的。”等我退出屋去,他屋子里的灯又亮了起来。

有一次,高政委刚刚午休,骑兵旅康健民旅长来见他。我请康旅长等候,而康旅长则要马上求见。在相互强调自己理由的争执声中,高政委已走出屋来,对康旅长说:“快来,快进来!”遂接待了康旅长。不多时,康旅长又匆匆离去了。事后,高政委同我谈话,他说:“同志们在前线很辛苦,来一趟不容易。以后,什么时候来人,就赶快告诉我。要待人热情、礼貌,多给方便。”接着又说:“基层的同志来了,告诉后勤,饭菜要做得好一点。”我感到高政委的一番话,是对我刚才那种粗鲁表现的批评教育,但无一句谴责之言,都是那么入耳顺心。这次谈话,使我顿时觉得好象明白了很多道理。

后来,高克林同志调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我曾去北京看望他几次,发现他过去那种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勤勤恳恳工作的老传统,一点儿都没有变。

(本文作者:王成章系包头市郊区体委离休干部;李文系中共包头市郊区委讲师团团长。)

问:政协全国委员会何时设立文史资料委员会?

答: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1959年5月12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增设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问 答

涉险护军粮的安玉成先生

安 静 口述 罗宏根 整理

解放前,安玉成先生开设的丰盛昌粮店,座落在今东河区西脑包前街 15 号院,主要经营粮油加工业务。资本总额折合人民币约 14 万元。

安玉成先生,又名安二毛旦,一生笃信基督教。因为他资助筹建西脑包的耶稣教堂,教区委他为该教堂的执事。

过去,原绥蒙政府副主席杨植霖同志,借宗教作掩护,做地下工作时,结识了安玉成先生。由于这一机缘,两人在长期交往中,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使安先生对共产党解放全人类的博大胸怀,逐渐加深了认识。1948 年,解放军进驻包头期间,杨植霖同志恳请安先生把丰盛昌粮店作为我军代兵站,他慨然允诺。同年 11 月,我军战略转移撤离包头时,上级决定把剩余的 200 多石粮食留在丰盛昌代存。安先生不避风险,接受这一任务后,花钱给侄儿安静买了一个包头市自卫队三营营长军职,以遮掩外界耳目。

国民党反动当局重返包头后,有人密告丰盛昌为解放军隐藏了一批军粮。当局遂以“通共”罪名,扣捕了安先生。在酷刑审讯中,他拒不承认。这时,安静凭借花钱买到的军职,请求包头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翁靖国从中斡旋。安先生取得保释后,潜行到绥蒙政府所在地丰镇,向杨植霖同志汇报了他因保护军粮所受迫害和军粮无损情况。杨植霖同志除了给予亲切的慰勉外,还分析当时的战局,叮咛他如果反动派裹胁西逃时,一定要坚守下来,等待我军第二次解放包头。

1949 年 9 月 19 日,董其武将军宣布绥远和平起义,包头市、县建立了人民政权。丰盛昌粮店,由县政府接收,定为三区后营子

井子沟粮食供应站,还从省城调进粮食 800 石,供应村民生活所需。安先生仍在该站工作,协助新派来的粮站负责人任建斌管理业务。不久,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他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捐献人民币 1 千万元(折新币 1 千元),表达了“保家卫国”的赤诚之心。

1951 年 12 月,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安先生被打成“老虎”(即所谓“有严重问题”的人),受了皮肉之苦,企业经济损失达 5500 万元(折新币 5500 元)。数月后,经县政府工作组调查,予以甄别平反。此后,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安先生筹措资金,办起了牛奶场。1956 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该场并入西滩合作牛奶场。这时,安先生年事已高,在家闲度晚年,于 1978 年农历腊月三十逝世,享年 84 岁。

(本文作者:安静系包头市东河区运输设备厂离休干部;罗宏根系包头市郊区经委离休干部)

包头市郊区乡镇企业发展情况一览表

(截止 1990 年 12 月)

项 目	企 业 数 量				
	合计	乡办	村办	联办	户办
全区乡镇企业总计	6020	87	197	102	5634
其中:一、农业性企业	2	1	1		
二、工业性企业	1204	56	170	83	895
1.煤炭采掘工业	121	9	104		8
2.铁矿采选业	1		1		
3.建筑材料开采工业	209		9		200
4.食品加工工业	179	4	6	13	156
5.饲料加工工业	4	1	2		1
6.造纸工业	10	1	2	2	5
7.炼焦工业	86	1		10	75
8.建筑材料工业	156	17	18	28	93
其中:砖瓦业	37	9	16	8	4
9.机械工业	83	10	2	4	67
10.冶炼工业	48	3	3	8	34